

#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家庭手工纺织业<sup>\*</sup>

张晓玲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延续了近代手工业,开辟了边区通往经济现代化的新方向,反映出边区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与前进。在战争背景下,其发展呈现区域化、传统化、市场化等特征。在近代手工纺织业发展进程中,尽管传统要素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抗战时期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的根基。边区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手工纺织业发展、传统力量延续的关键动力。历史证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市场化与工业化需同步前进,尊重传统要素、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亦至关重要。

**关键词:**抗战时期 晋绥 手工纺织业 工业化

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较为丰富,其他地区则较为薄弱。<sup>①</sup>就研究时段看,学者论述主要集中于抗战前,较少关注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手工业。<sup>②</sup>就学术观点看,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手工业经济的变化,虽然部分学者仍持“衰退论”,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延续和发展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只是手工业延续和发展的动力仍需突破。<sup>③</sup>自古以来,手工业就是乡村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在抗日根据地亦十分重要,且以纺织业较为普及。中共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根据地的手工纺织业是中共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关于根据地手工纺织业,学者注重考察妇女纺织运动,侧重探讨其政治意义,<sup>④</sup>甚少从经济史视角进行分析。就研究方法看,已有研究侧重使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其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使用虽然已广泛展开,但仍显不够。<sup>⑤</sup>总体来看,从经济史视角对抗战时期根据地手工纺织业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目前仍较为罕见,这与根据地手工纺织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极不相称。基于上述几点,本文拟梳理相关资料,勾勒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家庭手工纺织业<sup>⑥</sup>发展的基

[作者简介] 张晓玲,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呼和浩特,010070,邮箱:zhangxiaoling934@163.co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晋绥‘边区’经济发展史研究(1937—1956)” (批准号:15CJL037)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参见彭南生《近50余年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② 乡村手工业一直是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的薄弱之处(李金铮:《近20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述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据笔者管见,目前关于抗日根据地手工业,仅黄正林和光梅红分别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进行过考察(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光梅红:《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研究》,《晋阳学刊》2008年第4期)。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根据地家庭手工业有所涉猎,但因其是宏观、整体性研究,故而对于家庭手工纺织业未作深入探讨。

③ 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该方面成果主要有:张国祥《论山西妇女纺织运动》(《经济问题》1982年第9、10、1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刘晓丽《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许淑贤《抗日战争时期妇女纺织运动及其意义——以山西省武乡县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3期)。

⑤ 从总体看,整个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方法亦存在此不足。

⑥ 家庭手工纺织业是边区纺织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参见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抗战日报》1943年9月2日,第1—2版。本文讨论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不包括工厂、机关和部队的纺织业。

本概况,运用经济学相关研究方法对边区手工纺织业进行分析,以期验证中国传统手工业在抗日根据地的延续和发展,展现中共在敌人严密封锁下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图景,试图从理论和方法上拓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

## 一、近代手工业的延续:边区家庭纺织业的发展

在分析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时,学者常以手工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河北高阳、定县、宝坻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为例,并把日本侵华战争当成近代手工业发展变化的重要分水岭。事实上,抗战后,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手工纺织业以一种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姿态继续向前发展。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手工纺织业发展表现出快速扩张、分布较广但不平衡的特点。

### (一)快速扩张

由于特殊的政治和宏观环境变化,1941—1945年边区手工纺织业经历了快速扩张时期。这时期,织机、纺车、纺织妇的数量几乎都从零开始得到数倍、甚至数十倍增长。

晋绥边区属高寒山区,农业、手工纺织业并不发达。据资料显示,抗战前,许多妇女衣不蔽体;不少十多岁儿童严冬还赤裸着身体。临县一农家无衣无被,用一件烂皮背心一连包养大三个小孩。群众穿着破烂是常见现象。<sup>①</sup> 临县、离石是产棉区,土机织布曾有相当发展。康熙《临县志》就有:“棉微出”“布微出”的记载。民国初期,“城南且习纺织”,梭布列市交易。<sup>②</sup> 特别是在临南三交至碛口一带,几乎每家都有机子,每个妇女都会纺织。1925年后,新兴改良木机逐渐代替土机,土法纺纱被洋纱打垮。洋布在市面大量倾销,家庭手工纺织几乎完全停顿。据1940年6月临县调查统计,原有200余架改良机、2000余架土机完全停开。军民穿用主要是洋布。又据该年10月份统计,边区7县布匹入口值498701.4元,占入口总额的60%。<sup>③</sup> 可见,在洋布倾销下,边区手工纺织业亦难逃衰落的命运。抗战开始后,洋布来源减少,边区布匹供不应求,需求量巨大,土机织布再次抬头,边区手工纺织迎来迅速发展时期。

1940年新政权成立后,工业的恢复成为边区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首要目标。从这时起,很多妇女开始拿起纺织工具学习技术。1941年,群众纺织空前发展,新织机增加很多。1940年全区织机数共900架左右,1941年有4195架,开工约90%,是上一年的4倍以上。<sup>④</sup> 1942年后,手工纺织业有了更大发展。1943年,纺车、土机、改良机均增加了原有机数的2倍。<sup>⑤</sup> 1944年,边区各地群众种棉18万亩,产棉约200万斤,共有纺车5万架、纺妇6万人、织机9200架、快机1344架。<sup>⑥</sup> 临南是纺织人数最多的县。据统计,1943年该县有纺妇15324人、织妇9884人,1944年分别增至21928人、16604人,各增加0.4倍、0.7倍,分别占全县妇女人口的40%和30%。原先纺织业较落后的地区发展速度也很快。例如,1944年兴县有纺妇9220人,比1940年(300人)增加30倍,比1943年增加8.4倍。织妇比1940年增加650倍,比1943年增加8.7倍。<sup>⑦</sup>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止,全边区原有纺妇15190人,发展到128970人,增加7.5倍;原有织妇6958人,发展到33701人,增加3.8倍;原有纺车13347架,发展到112706架,增加7.4倍;原有土机3754架,发展到14545架,增加3倍;原有快

①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3年版,第1页。

② 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③ 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第二部分)——工矿生产》(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7—9,第1—2页。

④ 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9卷第3、4期(1944年2月25日)。

⑤ 庸庸:《保护土布生产》,《抗战日报》1943年1月19日,第2版。

⑥ 《晋绥解放区生产运动今年得到很大成绩》,《新华日报》1944年8月8日,第2版。

⑦ 《边区工矿业概况》,《抗战日报》1945年7月8日,第4版。

机 222 架,发展到 3 166 架,增加 13 倍。<sup>①</sup>可见,边区纺织业进步迅速。

可以说,至 1945 年边区纺织业不仅恢复了战前水平,而且扩大了纺织区。纺织已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群众普遍的家庭副业生产。不少地区的棉布不仅可以自给,还能卖出一部分供给军用及其他地区。例如,兴县赵家川口每人平均可穿 3 丈布,杨家坡每人平均 1.2 丈布。<sup>②</sup>临、离两县产布可供该分区 4 个县自给有余。<sup>③</sup>应该说,边区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改变了边区纺织业的落后状况。

抗战期间,家庭纺织业在其他根据地亦有很大发展。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纺织是农家主要副业。抗战后,家庭纺织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民衣着基本全部自给。凡是能劳动的妇女几乎都参加纺织。<sup>④</sup>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曾指出纺织业是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最重要的工业,而家庭纺织业是战时纺织业增长最快的部分。<sup>⑤</sup>

## (二)分布较广但不平衡

抗战期间,边区每个县都有手工纺织,纺织区分布很广。据资料统计,1940—1945 年,晋绥纺织区由 2 个县发展到 26 个县。过去丝毫没有纺织基础的兴县、神府、河曲、保德、神池、五寨等县亦发展成纺织区。连边缘区、游击区,如忻县、崞县、静乐、宁武等地也相继开展了纺织运动。纺织区域甚至扩张到山里。如临县后寨子,临南府底沟、西沟、杜家圪台、寺上村等村都出现了新纺织机。<sup>⑥</sup>曾在抗战期间参加张闻天农村调查的高鲁写道:“有地区妇女纺织已成为主业,只有在地里活急时,才以农活为主业。<sup>⑦</sup>而曾任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的周文日记记载:“蔡家崖不上学的儿童也组织起来和妇女一起学纺线(共 11 个儿童),每天能纺 22 两。每家每个妇女都有一个纺车。”<sup>⑧</sup>可以看出,边区纺织不仅区域分布广,而且已成为妇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 1941 年,军、政、民冬衣都用了土布,洋布数量极少。据 8 个县统计,人口布匹总量不过 200 匹,占人口总额的 18%。<sup>⑨</sup>新发展的纺织区亦可以做到大部自给。

边区纺织业分布虽广,但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临县、临南与离石。这一带妇女普遍参加土纺土织运动,各地多数成立精纺小组。如离石某村 150 个成年妇女,参加纺织的有 142 人。<sup>⑩</sup>特别是临县与临南两县是边区纺织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1941 年,这两地拥有边区 87.7% 的改良机、73% 的土机和 82% 的纺车。<sup>⑪</sup>至 1944 年,虽然其他地区的纺织业发展较快,但临离一带仍为纺织密集区。表 1 列出的是 1944 年边区从事家庭手工纺织业的人数、纺织工具及产量情况。

表 1 1944 年边区各地家庭手工纺织人数、纺织工具及产量情况

		纺织人数		纺织工具		纺织产量	
		数量(个)	占总量(%)	数量(架)	占总量(%)	数量(匹)	占总量(%)
一 分 区	兴县	10 520	12.98	9 747	11.61	25 000	10.46
	神府	3 870	4.77	3 690	4.39	2 637	1.1
	岚县	472	0.58	318	0.38	—	—
	小计	14 862	18.33	13 755	16.38	27 637	11.56

①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 2 页。

② 《边区工矿业概况》,《抗战日报》1945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

③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 2 页。

④ 参见柴树藩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 页。

⑤ [德]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2—245 页。

⑥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 2、3 页。

⑦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3 页。

⑧ 周文:《周文文集》第 4 卷,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0 页。

⑨ 中共晋西区党委:《抗战中的晋西北纺织业》(1941 年 12 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2 页。

⑩ 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 9 卷第 3、4 期(1944 年 2 月 25 日)。

⑪ 中共晋西区党委:《抗战中的晋西北纺织业》(1941 年 12 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 160 页。

续表

		纺织人数		纺织工具		纺织产量	
		数量(个)	占总量(%)	数量(架)	占总量(%)	数量(匹)	占总量(%)
二分区	河曲	4 296	5.3	4 768	5.68	141.5	0.06
	保德	6 705	8.27	8 006	9.53	2 214	0.93
	岢岚	765	0.94	811	0.97	107	0.04
	神池	—	—	20	0.02	—	—
	五寨	5	0.01	—	—	—	—
	小计	11 766	14.51	3 585	16.18	2 462.5	1.03
三分区	临县	14 779	18.23	12 478	14.86	37 190	15.56
	临南	19 532	24.1	28 328	33.73	133 169	55.73
	离石	15 515	19.14	11 933	14.21	37 362	15.64
	小计	49 826	61.47	52 739	62.8	207 721	86.93
六分区	宁武	575	0.71	521	0.62	33	0.01
	静宁	202	0.25	82	0.1	—	—
	忻县	20	0.02	68	0.08	—	—
	小计	797	0.98	671	0.8	33	0.01
八分区	离东	1 673	2.06	1 093	1.3	1 061	0.44
	静乐	522	0.64	622	0.74	24	0.01
	交东	388	0.48	488	0.58	—	—
	交西	730	0.9	561	0.67	—	—
	小计	2 195	2.7	1 715	2.04	1 085	0.45
	朔县	166	0.2	162	0.19	—	—
	偏关	317	0.39	279	0.33	15	0.01
	小计	483	0.59	441	0.52	15	0.01
合计		81 052	100	83 975	100	238 953.5	100

资料来源:据《1944及1945年纺织劳动人数统计表、纺织工具统计表》(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247—252页)相关数据整理。

说明:纺织人数包括纺妇和织妇;纺织工具包括纺车和织机。

表1显示了边区家庭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可以看到,三分区是边区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1944年,该区占全部纺织人数的61.47%,纺织工具的62.8%,纺织产量的86.93%。一分区次之,上述指标分别为18.33%、16.38%、11.56%。二分区虽然拥有约15%的纺织人数和纺织工具,但产量仅占总量的1.03%。六分区、八分区及塞北分区属边缘区和游击区,上述纺织指标均在总量的3%以下,有的不足1%,甚至为0。从棉布产量看,1944年全边区产量为23.9万匹。其中,三分区最高,为20.8万匹;一分区次之,约为2万匹;二分区第三,仅有约0.2万匹;八分区有0.1万匹;六分区和塞北区分别为33匹和15匹。在短短5年内,边区家庭棉布产量由0快速增加至23.9万匹。可以说,家庭纺织的棉布产量增加很快。又据资料显示,1944年边区棉布的总产量是60万匹。<sup>①</sup>由上可计算出,家庭纺织的棉布产量占边区纺织总产量的40%。显然,家庭纺织业在边区纺织业中占相当比重。显而易见的是,虽然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迅速,但发展极为不平衡,纺织业依然集中于以往有纺织基础的地区。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将边区家庭纺织业分布及纺织业较发达的重要村落作示意图如下:

从图1看,边区手工纺织业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化。大体来看,可分为四类区域:第一类是核心区。临县、临南两县无疑是边区手工纺织业的中心。该两县周围纺织业较为发达的村落约有30个。

<sup>①</sup> 《晋绥解放区军民在当地政府积极扶持下,生产成绩斐然可观》,《新华日报》1945年2月22日,第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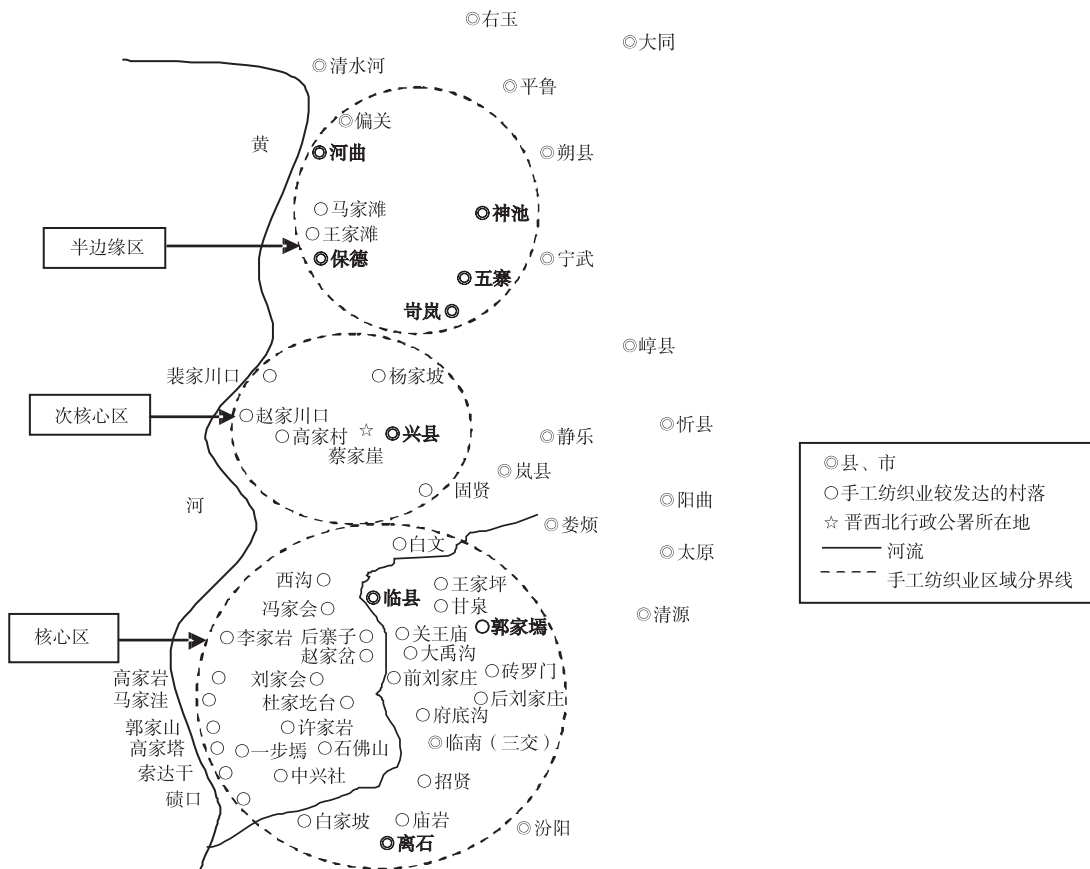


图1 边区家庭手工纺织业分布示意图

说明:手工纺织业较发达村落的选取标准是:中共晋西区党委1941年对晋西北群众纺织典型调查选取的临县8个村(其年产土布均在1000匹以上)、临南县47个村(其均有手工纺织,但文中只选取年产棉花1000市斤以上的13个村)、兴县5个村(年产土布500匹以上)以及1941年为临县同济转运栈提供土布的6个主要村落和1943年保德开展妇纺运动的2个典型村。

其余各村大都有发展程度不等的纺织业。在手工纺织业方面,临县、临南的地位明显高于兴县。第二类是次核心区。以兴县为中心的区域是边区纺织业次核心区,兴县周围虽有几个纺织业发展较快的村落,但其生产能力明显低于临县。第三类是半边缘区。二分区河曲、保德等地是纺织新开展区,纺织业虽有所发展,但还没有类似于临县或兴县的纺织集中村落。1943年高鲁在河曲县抗联时就写道:“河曲纺织业发展过于分散,要集中。”<sup>①</sup>第四类是边缘区。除上述三类区域外的其他地区是边缘区,手工纺织业分布更为零星和稀少。核心区和次核心区的关系大体是:核心区纺织总量大于次核心区,但次核心区的发展速度快于核心区。可见,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和分布呈现发展迅速但分布不平衡、不均匀的态势,表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其与边区集市的分布及特征有相似之处。<sup>②</sup>总体来看,手工纺织业分布集中的区域一般也是集市较为密集的区域,而纺织业不发达地区亦是集市分布稀少的区域。可以说,边区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与乡村集市贸易的繁荣相辅相成。

## 二、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动力

抗战期间,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为:一是传统因素,从事纺织业可

①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第505页。

② 张晓玲:《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集市贸易》,《历史教学》2014年第10期。

以提高农民收入、维持农家生计；二是制度因素，边区政府鼓励发展纺织业的相关政策措施创造了支持纺织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这在纺织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一）传统因素

提高农民收入、维持农家生计是边区纺织业发展的传统力量。费孝通认为，农村手工业是农村经济的必要部分，中国农业并不能单独养活农村的人口，是手工业帮着农业来养活庞大的乡村人口。<sup>①</sup> 黄宗智将手工业看作农户补充收入的手段，但认为手工纺织仅能为农户提供够糊口的微薄收入。<sup>②</sup> 近代以来手工业的衰落导致农民生活下降，说明从事手工业是农民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抗战期间，从事手工纺织业虽不能使边区很多农户致富，但却可以使大部分农户收入增加、家庭生计得以维持，部分农户致富。特别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严重的经济封锁使洋布入口锐减，布匹价格飞涨，极大刺激了家庭土布生产，从而使农民经济状况有较大改善。如边区某村全家2男2女7个月连续纺带织净赚银洋800元。另一女子纺花半年净赚农币1600元。<sup>③</sup> 又如临县兴黎村车茂荣家婆媳三人，3天可织1匹布。王村车老万女人一年仅纺花净赚农币3500元。五区坡家垣、白致良两妇女一年织布12匹、纺花12斤、织口袋20条，其生活因纺织大大提高。赵家川口一抗属，其生活除政府补贴外，全靠纺花解决。一个妇女每天用纺织所得，完全够一个人日常生活。<sup>④</sup> 再如，临县索达干村（共244户），1944年除自己穿衣及自由卖出的布匹外，仅代公家订织的标准布即有864匹。该村公粮负担90石，除去公粮还剩余30石。各县农民因纺织得利，赚钱买房买地翻身的，为数不少。临县53岁高三女靠织标准布买下6亩地、半头牛、1架土机。<sup>⑤</sup> 不仅纺织业较发达的临县，过去无纺织基础的河曲、保德等地农民亦通过纺织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例如，河曲全县76000人，1945年织布45700匹，基本可自给。兴县、保德、神府等县，大体如此。这些地区，妇女孩子已经能够穿上簇新的衣服，过去衣衫褴褛的情景大大减少。<sup>⑥</sup> 1944年，高鲁在中共晋绥分局党校时写道：“在呼家庄，妇女纺线能解决穿衣问题，有余时还能换些钱。”<sup>⑦</sup> 不少农民高兴地说：“这一下可把咱半个穷根斩断了，过去一年受下来，净换布就得差不多费去一半的粮食。”<sup>⑧</sup> 可见，抗战期间手工纺织业对稳定和维持农家经济、改善农户生活有很大作用。

### （二）制度因素

不可否认，传统因素有助于边区家庭纺织业的发展，但纺织业发展显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植，故制度是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制度促进边区纺织业发展可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是宏观层面。这表现为边区有效的制度环境降低了纺织业发展中的交易（或生产）成本、减少了交易（或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为家庭纺织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和 environment。抗战期间，在外部经济封锁情况下，边区棉纺织业面临供给严重不足和需求巨大的局面。为解决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自1941年始，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家庭纺织业是大生产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指出，解决边区穿衣问题“一是依靠国营工业；二是依靠民间妇女织布；三是依靠合作社。”<sup>⑨</sup> 其中，家庭纺织业是关键，“是达到全边区穿衣自给的最大保证。”<sup>⑩</sup> 正如时人所言：“我们妇女

① 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费孝通文集》第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6—87页。

③ 膺庸：《保护土布生产》，《抗战日报》1943年1月19日，第2版。

④ 亚苏：《晋西北妇女纺织运动》，《抗战日报》1943年3月9日，第2版。

⑤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3、6页。

⑥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5页。

⑦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第512页。

⑧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3页。

⑨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卷5，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1页。

⑩ 《论自纺自织》，《解放日报》1945年5月13日，第1版。

们都织起布来,队伍就有穿的,老百姓也有穿的,大家的生活过得好,打鬼子就更有办法。”<sup>①</sup>因此,边区政府给予家庭纺织业发展一定的宏观制度支持。正是在此制度环境下家庭纺织业得以快速发展。<sup>②</sup> 具体而言,边区政府主要在税收、资金、原料、工具、技术及销售等方面提供有助于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制度安排。<sup>③</sup> 其一,税收制度。战时边区政府执行种棉免征公粮、妇女纺织不征税等税收保护政策。例如,1943年规定纺织收入3年免征公粮,后又延长了3年;试种棉全免公粮并赔亏损一半。<sup>④</sup> 同时,政府还实施土布贸易保护政策。一方面提高布匹入口税,另一方面降低土布出口税。其二,资金制度。这期间,边区政府发动贷款计划为家庭纺织生产提供贷款资金。如1943年,为推动纺织业发展,边区政府发出纺织贷款50万元。<sup>⑤</sup> 1945年,边区发出纺织贷款1600万元、棉花1万斤。<sup>⑥</sup> 不仅如此,政府还准备好纺车、织机和棉花,配上受过训练的纺织推广员,以解决纺织原料、工具、技术以及销售等方面的实际困难。<sup>⑦</sup> 从事后绩效看,这一系列制度对家庭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是微观层面。这主要表现为边区有效的制度为家庭纺织业发展提供了激励机制。经济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家庭纺织的产权已最小化到家庭这一生产单位,家庭纺织的成本和收益是一致的。因此,上述制度保护刺激着妇女经济人本性的发挥,对妇女形成一定激励,极大调动了妇女纺织的积极性。她们不断创新、努力纺织,“所有妇女(包括老婆婆和小女孩)几乎人人纺织。”<sup>⑧</sup>甚至“有些婆姨回娘家也带着羊毛,手不闲着。”<sup>⑨</sup>“送饭的和有娃娃的妇女,抽时间就纺线。时间多就多纺,时间少即少纺。”<sup>⑩</sup>很多农民惊讶地说:“想不到纺花织布这些外路的事,咱们这些地方也能干了。……共产党真是说干甚就能干成甚。”<sup>⑪</sup>显然,边区政府规定的相关制度产生了绩效,使得整个边区社会的妇女充满了“生产精神”,并最终导致家庭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正如林毅夫所说,“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sup>⑫</sup>

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以下一般结论提供了根据: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稳定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的决策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绩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有效制度较缺乏的地区或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越大、制度效率越高。总体来看,可以说边区政府的制度是抗战时期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 三、纺织原料情况

原料是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的重要要素。边区纺织业的原料种类是传统与现代结合,但较多使用传统原料,以土纱代替洋纱。原料来源范围是内外结合。

① 《劳动英雄大会开幕、生产展览会同时举行》,《抗战日报》1942年12月19日,第1版。

② 马克·赛尔登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研究亦表明:根据地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是由政府和军队这种行政技能最发达的机构推动。参见[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46—247页。

③ 工具、技术、销售方面的制度支持将在下文论述,此不赘述。

④ 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抗战日报》1943年9月2日,第1—2版。

⑤ 亚苏:《晋西北妇女纺织运动》,《抗战日报》1943年3月9日,第2版。

⑥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4页。

⑦ 事实上,即便在纺织业非常发达的河北高阳地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冀中根据地政府在高阳的首次尝试亦是帮助贫穷的织户购买织布机,这是其在抗战时期指导根据地乡村生产运动的宝贵经验。参见[日]顾琳著,王玉茹等译《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⑧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3页。

⑨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第512页。

⑩ 周文:《周文文集》第4卷,第160页。

⑪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3页。

⑫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美]罗纳德·H. 科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283页。

抗战开始后,边区手工纺织业的现代原料减少,传统原料渐增。现代机器生产的原料——洋纱<sup>①</sup>来源日益困难。据调查,1940至1941年上半年,边区洋纱供给主要来自太原、榆次、平遥、绛州等各大纱厂。之后,由于敌人封锁严重,洋纱几乎绝迹。在此情况下,边区纺织业主要依靠传统原料(即土纱),棉花需要量逐渐增多。边区棉花来源一方面是本地种植,另一方面是从外地运来。外地棉花主要由晋西南及河西运来。据不完全资料显示,1941年棉花输入超过上年10倍以上。<sup>②</sup>很显然,抗战时期边区纺织业虽然主要使用传统原料,但其来源已不仅仅局限于本地供给。手工纺织业与原料种植的结合程度大大降低。边区纺织业不再建立在原料生产的基础上。

进一步来看,较多使用传统原料、以土纱代替洋纱的现象是在外部封锁环境下出现的不得以而为之的特有现象,并非农民抵制洋纱的结果。抗战后,洋纱价格飙升。洋纱价格暴涨导致改良木机的织布成本短期内迅猛增加,而利润降低。从图2可以看到,抗战后土机和改良木机的成本出现显著增长的趋势,但改良木机成本增速更快,这使其成本迅速超过土机。与此同时,改良木机的利润呈现下降趋势,土机利润则逐渐胜过改良木机。正由于此,边区人们选择了较为落后的纯土纱织布。特别是试用土经土纬织布获得成功,土布产量骤增,质量亦有改进,有的土布质量甚至可以和洋纱织的布相比。<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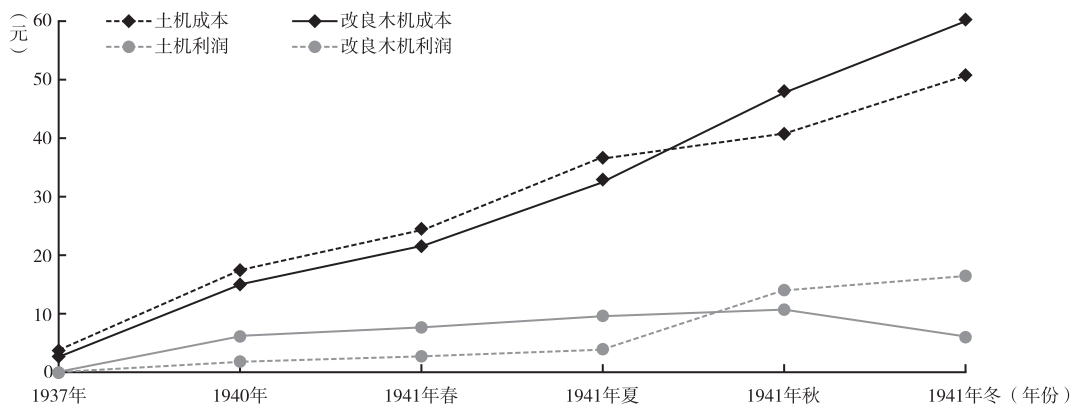


图2 1937—1941年改良木机与土机织一匹布的成本、利润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第二部分)——工矿生产》(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7—9)第11、12页有关数据整理。

不过从长期来看,改良木机织布更受欢迎。原因在于,改良木机纺织方式的年产量高、总成本低、布的质量好。表2展示的是1941年土洋结合与纯土纱织布两种方法的成本与利润。

表2 1941年边区两种织布方法的成本、利润表

织布方法	使用织机类型	价格(元/匹)	成本(元/匹)					利润(元/匹)	年产量(匹)	年利润(元)
			洋纱	土纱	需工折合	间接成本	合计			
土洋结合	改良木机	65	30	17.6	2.4	7.2	57.7	7.3	300	2 100
纯土纱	土机	60	0	35	8	4.3	47.3	12.7	90	1 143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第二部分)——工矿生产》(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7—9)第11页有关数据计算。

说明:土洋结合织布一般使用改良木机,而纯土纱织布使用传统土机。

① 这里指国产机纱。由于资料中一般写为洋纱,故文中把国产机纱称为洋纱。

② 中共晋西区党委:《抗战中的晋西北纺织业》(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163、164页。

③ 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9卷第3、4期(1944年2月25日)。



由表2可看出,改良机节省劳力,需工少,是土机的30%,但洋纱价格高,故而原料费是土机的1.6倍,每匹布利润7.3元。土机需工多,但不需要洋纱,原料费用低,每匹布利润12.7元。然而,从全年看,情况则有很大不同。改良机产量高,一般一人一架年产300匹(每天按10小时算,下同),一年可获利2100元。土机产量小,年产仅90匹,一年利润1143元。<sup>①</sup>很显然,由于改良机织布产量高,其年利润高于土机。田野访谈中,边区妇女对土纱和洋纱是这样讲的:“洋纱做经线、土纱做纬线织的布又细又密,用纯土纱织的布比较粗,窟窿较大。后来都土洋结合织布了。”<sup>②</sup>因此,抗战时期尽管洋纱价格高昂,西安大华纱厂出品的洋纱仍通过商人走私运输经过遥远的路进入边区。<sup>③</sup>这说明,边区农民不偏爱土纱,懂得选择产量大、利润高的洋纱。只是由于洋纱难得才选择土纱。这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

以上说明,在近代以来经济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相互依存,传统因素对经济现代化有着长远而深入的影响。关于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争论。<sup>④</sup>但目前较多学者肯定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李金铮在分析抗战前定县手工业时批判了曾经流行的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的“二元经济论”,并指出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sup>⑤</sup>彭南生把机器大工业后农村手工业发展的现象称为“半工业化”。<sup>⑥</sup>欧洲经济史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后,手工业是机器工业的重要补充和附属。马克思通过对服饰业的调查说明过这一点。<sup>⑦</sup>因此,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乡村手工业并非一定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阻碍。<sup>⑧</sup>费孝通曾指出乡村工业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sup>⑨</sup>吴承明一再强调手工业对于经济近代化、现代化的贡献。<sup>⑩</sup>林刚也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可能脱离传统和国情。<sup>⑪</sup>史建云亦提出近代农村手工业促进机器工业发展的观点。<sup>⑫</sup>进一步看,其实何止是近代,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村的土纺土织亦是禁而不止;一旦政策松动,土纺土织便又发展起来。<sup>⑬</sup>显然,传统家庭手工业对于现代化的作用不容忽视。尽管发展家庭纺织业是战时边区政府为解决军民穿衣问题的权宜之计,但正是因为传统本身对于现代化有重要作用,才使得边区政府推动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制度得以成功实施并取得成效。

① 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第二部分)——工矿生产》,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7—9,第11页。

② 采访人:张晓玲。采访对象:张双鱼(女),1930年5月出生,山西省临县碛口镇人,小学文化程度,务农。采访时间:2014年8月12日。张晓玲笔录保存。

③ 中共晋西区党委:《抗战中的晋西北纺织业》(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163页。

④ 彭南生:《近50余年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⑤ 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

⑦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1—542页。

⑧ 不少学者(如严中平、黄宗智、陈庆德等)认为乡村手工业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参见彭南生《近50余年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日本学者森时彦亦指出传统部门的土布生产随着近代工业化发展而不断衰退。参见[日]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页。

⑨ 费孝通:《内地农村》,氏著:《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⑩ 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⑪ 林刚:《传统、变革与国情——对鸦片战争后至抗战前中国手工业的一个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⑫ 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⑬ 徐建青:《棉花统购、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与手工棉纺织业》,《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四、纺织工具与技术

生产工具和纺织技术是手工纺织业的又一重要要素。从西方国家工业化历史来看,纺织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及技术变革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工具主要是传统工具。事实上,即便是近代手工纺织业较为发达的河北定县,其生产工具也以传统为主。<sup>①</sup>据兴县、临县、临南、离石、方山调查,1941年5县共4195架织布机,其中铁机15架,改良机855架,土机3325架。<sup>②</sup>铁机仅占0.4%。就连晋西北纺一厂织土经布亦未试用过铁轮机,只使用木机(俗称快机)。<sup>③</sup>晋西北纺织业最发达的临南县,其纺织工具依然全部是土机和快机,用铁机纺线织布非常罕见。<sup>④</sup>在妇女纺织中,土机和快机更受欢迎。兴县妇女纺织工具的基本情况反映出这一特征,见表3。李金铮对近代定县纺织业的研究亦表明“一般妇女多不愿用铁机而喜用木机。”<sup>⑤</sup>

表3 1940—1944年兴县妇女家用织布机基本情况 单位:架、%

年份	总数	土机	占总数百分比	快机	占总数百分比
1940	4	2	50	2	50
1941	8	2	25	6	75
1942	20	7	35	13	65
1943	85	33	38.8	52	61.2
1944	309	159	51.5	150	48.5

资料来源:沈越:《兴县今年的春耕运动》,《抗战日报》1944年8月31日,第4版。

不过,在边区流行的纺织传统工具并非保持原样,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良。1944年《解放日报》评论说,“在开展纺织运动中,纺织工具正在不断的改造。”<sup>⑥</sup>改良工具的原因一是使精纺土纱能代替洋纱做经线用。土经布每寸摆多少经线才能使布的密度适中,一直是困扰边区纺织生产的问题。<sup>⑦</sup>为此,边区政府一方面奖励精纺土纱,代替洋纱;另一方面积极改进技术和工具,研究自纺经纱,改造七七纺纱机及手摇纺纱机,使精纺土纱能在改良机使用。二是,抗战期间已有传统工具大多损坏严重,必须进行改进。高鲁指出:边区不少地方的纺车“用烂剪刀做摇把,铁丝锭子跳得太厉害不行。干部必须注意解决这些问题,帮助改进工具。”<sup>⑧</sup>陕甘宁边区的纺织工具亦主要为传统的且较为落后。<sup>⑨</sup>在绥德,纺纱所用的都是手摇纺车,织布绝大多数是土机,手拉机在农家中用的很少。<sup>⑩</sup>“极落后的手纺机、捻线锤……纺织业的发展首先是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与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行到新的。”<sup>⑪</sup>为此,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制度安排改进、推广纺织技术。这些制度安排有:

第一,举办纺织生产展览会。展览会是展示、宣传、推广纺织技术最有效方式之一。边区政府多次组织纺织生产展览会推广纺织技术。历次纺织生产展览会均有棉花、棉纱、棉布、毛布、毛衣、纺织用具、新式纺纱车、绕线车、打毛衣用具、轧花车等展出,以及从植棉到织布的演示过程。例如,1942

① 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发动妇女纺纱织布》,《抗战日报》1940年12月18日,第1版。

③ 《晋西北纺一厂织土布的初步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5日,第3版。

④ 参见《临南县纺织工作总结》(1945年8月2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253—256页。

⑤ 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晋西北战斗纺织厂自造弹花机齿条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9日,第2版。

⑦ 《晋西北纺一厂织土布的初步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5日,第3版。

⑧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第534页。

⑨ 马克·赛尔登认为,陕甘宁边区纺织业是中共利用家庭纺织业的传统和现成的传统工艺而发展起来的。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译本),第246页。

⑩ 柴树藩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20页。

⑪ 《陕甘宁边区纺织工业的现状》,《新华日报》1942年1月18日,第3版。

年生产展览会展出边区自制的18根锭子脚踏纺纱机和15头手摇络纱机。织布机有铁制和木制的,有织2尺多宽的洋布机和织1尺多宽的“抗战布”机。<sup>①</sup>1943年展出了保德劳动英雄白候小制造的能纺又快又能匀紧经线的纺纱机,以及工具厂改进的手摇络纱机和仿造的铁织机、七七纺纱机。<sup>②</sup>1944年展览会展出了党校一部制造的十二叶双弦纺车,摇起来很稳,用双弦使锭,不易摇动,可使线拉匀。还有工具厂试制的木轧花机,该机每天能轧40斤籽花,比土轧花机高3倍。<sup>③</sup>1945年展览会不仅陈列20多块好布,还展出精纺精织账单:“好布一匹,用花二斤四两,卖价三千二百元,能穿二三年;坏布一匹,用花二斤十四两,卖价二千三百元,顶多穿半年。”<sup>④</sup>不难看出,生产展览会在政府的技术制度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二,训练纺织干部。抗战期间,边区政府多次举办纺织训练班培训纺织干部,并采用技术送上村的作法传授纺织技术。一般是:由县区召开训练班,动员妇女干部及积极分子学习;然后由政府贷给学会纺织的妇女纺车及棉花,将其分派到农村召开训练班。例如,兴县杨家坡杨雨儿在边区纺织厂学会纺纱织布后,先后组织5期纺织培训班,共教会300多名妇女。<sup>⑤</sup>五寨妇女部长张守忠走遍各村亲自纺纱织布传授技术。神池杨林在义井村发动纺织时亲自将妇女们的鸡蛋收集起来担到贸易局换回棉花,教妇女纺线。兴县五区康桂英训练的纺妇有800多人。<sup>⑥</sup>这种办法获得广大妇女及其家庭的支持。很多妇女纷纷报名参加,“甚至年近花甲之老人亦赶来受训纺纱”<sup>⑦</sup>。

第三,鼓励妇女创新。妇女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纺织技术创新。边区政府倡导妇女认识、爱护工具,注意工具的创造与修理。在纺织过程中,边区妇女自己创造多种代用工具,代替买不到的外来器材如锭、杼等。<sup>⑧</sup>二是组织形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妇女变工记工组织纺织与组织纺织生产合作社上。例如,1943年,离石妇女发动纺织合作运动,以提高妇女纺织生产积极性。<sup>⑨</sup>1944年,张家梁村会纺织的妇女28人,其中16人带着纺车变工。<sup>⑩</sup>该年,《新华日报》还专文刊登临县妇女刘能林组织妇女纺织合作社的事迹。<sup>⑪</sup>有的合作社还开办纺织训练班,吸收社员及附近妇女传授技术。组织形式创新代表了边区家庭纺织发展的新方向,不仅有效地传授了纺织技术、解决了资金困难问题,还提高了纺织效率。

第四,规定公营纺织厂、农具厂研究改进纺织工具及技术。为推广改良机和织布技术,边区政府规定各公营纺织厂、农具厂等均须研究改良木机用土经的技术,逐渐完全改用土经,并将研究结果向民间介绍推广。<sup>⑫</sup>例如二分区某纺织厂研制出仿德货制轧花机,从转轮、带动轮到轧花滚均为翻砂铸造,每天能轧300斤籽花,和舶来品并无差别,而价值仅为外货的一半。<sup>⑬</sup>1943年晋西北农具厂研制出每天弹40斤棉花的弹花机。<sup>⑭</sup>

① 雷行:《生产展览会》,《抗战日报》1942年12月22日,第4版。

② 《晋绥边区四三年度生产展览会开幕》,《抗战日报》1944年1月15日,第1版;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9卷第3、4期(1944年2月25日)。

③ 黎军:《战斗生产展览会上——生产部分》,《抗战日报》1944年12月22日,第4版。

④ 穆欣:《参观文化棚》,《抗战日报》1945年7月14日,第4版。

⑤ 任子杰、贾银玉:《纺织英雄杨雨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兴县文史资料》第8辑,2004年印刷,第64页。

⑥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5页。

⑦ 《晋西北妇女积极参加纺织,陕北米脂纺纱英雄获奖》,《新华日报》1943年5月13日,第2版。

⑧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5页。

⑨ 《晋西北妇女争作劳动英雄,热烈展开纺织运动》,《新华日报》1943年3月28日,第2版。

⑩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第534页。

⑪ 鲁石:《刘能林怎样组织纺织》,《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2日,第4版。

⑫ 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抗战日报》1943年9月2日,第1—2版。

⑬ 黎军:《战斗生产展览会上——生产部分》,《抗战日报》1944年12月22日,第4版。

⑭ 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

边区政府大力推广纺织技术的制度安排取得良好绩效。不少妇女把手传梭土机改为改良快机。过去快机织布,经线需用外来洋纱。纺纱技术提高后,完全采用土纱织布。纺织工具的改进导致织布技术提升,大大提高了纺织产量和质量。例如,临南薛汝花、离石刘尚英用快机织的标准布漂亮又结实。临县刘能林蓝白相间的席瓣花布,不但平正匀称且细软、光亮,和洋布不相上下,在三分区有“花布之王”的称号。<sup>①</sup>

总体而言,虽因战时经济封锁,边区不得不大量使用土机、土纱纺织,但由于边区政府的大力鼓励,土机得以改良,纺织技术得以提高,使得边区提高纺织生产效率、活跃边区经济成为可能,进而实现军民衣料自给。其他根据地纺织亦主要使用土机土纱,也有纺织工具改进的情况。例如,陕甘宁、晋冀鲁豫边区不惜以数十万元为资本研究洋纱的代用品与改良纺织的工具。政府还给足够的资本与行署工具厂,使之安心研究纺织工具的改进。<sup>②</sup>

不过,与战前中国纺织业发达地区的手工纺织技术进行比较,边区妇女的织布技术还相对落后。据资料载,边区上等技术的纺妇3天织1匹布,中等技术的5天织1匹布。<sup>③</sup>1941年临县8个自然村典型调查表明,改良机一年织布300匹左右(最高375匹,最低200匹,平均基本可接近1机1天1匹),而土机仅90匹左右。一个农妇一年织布平均90匹(最高约111匹,最低55匹)。<sup>④</sup>据调查,20世纪初期江阴农村每台织机每天可织布1匹,一年共织布180匹(不是每天都工作)。而同期的上海郊区,一个农妇每天织布1匹,一年织布200匹左右。<sup>⑤</sup>可见,抗战时期,边区改良机的技术、性能基本接近纺织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20世纪初的水平,而妇女的织布技术则与该时期江南水平相差较大。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第一部分数据显示,边区有些县份如二分区各县、静宁、忻县、朔县等,虽然拥有一定量的纺织人员和纺织工具,产量却很低,甚至没有产量。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区妇女较低的纺织技术。

## 五、纺织品的市场销售

流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工业的扩大以市场扩大为前提。顺畅的市场销售是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基础。市场化是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手工纺织业的重要特征。边区手工纺织业与传统手工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生产目的不仅为家庭消费,也为市场生产,还有跨县份销售。新政权成立后,边区内部商业、集市逐渐恢复,纺织品的原料供给与成品推销均比较流畅。临离集市上,每天上市土布平均不下八九百匹。临南招贤、磧口及离石集上,每次都有大批土布上市。河西葭县、神木、府谷、保德、榆林等地布匹,大都依靠晋西北,数量很大。<sup>⑥</sup>临县同济转运栈是代客买卖货物的过载店,主要任务是布匹收销。该转运栈几乎统制了市面上的土布交易,上市布匹中70%以上由该栈经手买卖。临县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市场,且几乎能够全部售出。如土布产量较高的1941年,该年5月同济转运栈土布的售出率为94.7%,87%的销售量在临县以外县份,7%销往本地,6%销往临县较大的白文镇。具体销售情况见表4:

① 黎军:《战斗生产展览会上——生产部分》,《抗战日报》1944年12月22日,第4版。

② 乔正:《发展纺织业的几个问题》(1941年10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146—148页。

③ 亚苏:《晋西北妇女纺织运动》,《抗战日报》1943年3月9日,第2版。

④ 根据中共晋西区党委《抗战中的晋西北纺织业》(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159页)相关数据计算。

⑤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3、472、553页。

⑥ 中共晋西区党委:《抗战中的晋西北纺织业》(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165页。

表4

1941年5月临县同济转运棧土布销售情况

单位:匹、%

种类	上市数	买入	卖出	售出率	来源	销路
4丈	2 068	1 481	1 458	98.5	50% 来源于临县前后刘家莊; 50% 来源于郭家塢、赵家岔、石底 沟、甘泉	兴县 48.5%; 神木 38.5%; 临县白文镇 6%; 本地 7%
5丈	1 868	1 570	1 432	91.2		
合计	3 936	3 051	2 890	94.7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第二部分)——工矿生产》(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 A22—7—9)第9页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边区销售代理使得家庭织户不断调整织布质量及标准,以适应战时不断变化的销售环境。与此同时,边区政府亦颁布了便于土布销售的相关政策。一方面规定土布标准。抗战时期,边区土布的宽度、长度、卷度与重量很不一致,极大影响销售。为此,政府对土布标准作了规定。一种长度为4丈8尺,宽度为1尺3寸;一种长度为2丈8尺,宽度为1尺3寸。经线如用洋纱至少各为720根,如用土经至少各为650根。每卷各为30匹。贸易机关与各公营商店均依照统一标准收买,售出时加盖本商店图记。<sup>①</sup>另一方面,政府订购标准布。政府订购标准布的作法,对于纺织数量及质量的提高起很大推动作用。政府规定统一标准,供给原料,发给工资(工资是相当高的)或以一定价格收买,织下布立刻换钱,可以预领工资,也可以顶交公粮。这种方法比自己织布拿到集市卖既便宜又不愁销路。如果布织得好,还有额外奖赏。群众把标准布叫作“翻身布”,表示他们对标准布办法的拥护。<sup>②</sup>显而易见,纺织品销售的制度约束鼓励了手工纺织生产。

可以说,边区纺织品销售基本不成问题。只有在季节性萧条时,囤布者少,织布农户的成品不能全部销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贸易局会收买土布土纱,有计划向边区各地推销,并奖励贩运土布的商人,使织布户得以顺利生产。在新纺织区,边区政府还在重要市镇设立机构建立纱市,确定专门机构专营土布业务。<sup>③</sup>不难推断,边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已经卷入市场。事实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家庭手工纺织的商品生产成分亦高于自给性成分。<sup>④</sup>

显然,外部经济封锁和物资统制客观上推动了边区手工纺织业的繁荣,而边区内部市场需求则拉动了边区乡村手工业的延续与发展。商人以及转运棧是联系边区手工纺织业者与市场的桥梁,他们将手工纺织品销往边区各县。政府则为边区手工纺织业的市场销售提供了制度保障,界定并型塑了一个能够激励手工生产的边区市场体系,这是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可以说,在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进程中,市场化与工业化同步前进,<sup>⑤</sup>市场化是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 六、结语

抗战期间,尽管历经残酷的战争、严峻的经济封锁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但晋绥边区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在边区纺织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带有明显的区域化,表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边区工业发展的基本轨迹。传统因素固然是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动力,但关键动力是边区政府鼓励家庭纺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虽然土洋结合的纺织方式产量、收益更高,但边区手工纺织业的生产要素更多采用传统要素。这是抗战特殊环境导致的特有现象,反映了传统力量的持久性和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相互依存性。边区政府积

① 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抗战日报》1943年9月2日,第1—2版。

②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晋绥解放区妇女纺织发展概况》,第6页。

③ 晋西北行政公署:《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抗战日报》1943年9月2日,第1—2版。

④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1981年,第554页。

⑤ 关于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相关理论,参见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极推动纺织技术改进和纺织组织形式创新,使妇女纺织技术提高很快。但与20世纪初江南织布技术相比,该时期的纺织技术仍然较为落后。尽管如此,边区手工纺织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产品销售较为顺畅。边区手工纺织业发展是市场化与工业化同步前进的结果。

进一步来看,抗战时期手工纺织业为边区军民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在维持根据地农家经济、保障供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晋绥边区政府在推动手工纺织业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从群众利益出发,将发展纺织与抗日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曾经一度中断,但还是实现了手工纺织业在战争环境下的延续与发展。这表明,传统的手工生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尊重传统要素、注重传统的延续性,而不是抛弃或否认。李金铮提出,在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演变中,现代因素远未占领农村手工业的阵地,手工业的变化更多是传统因素所致,传统力量绝非不堪一击。<sup>①</sup>边区手工纺织业的延续和发展进一步检验了这一结论。

基于上述认识,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审视,抗战时期家庭手工纺织业发展开辟了边区通往经济现代化的新道路、新方向,反映出边区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与前进。它不仅使被日本侵华战争中中断的近代农村经济现代化进程得以延续,而且证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梯。从更广阔的空间视野看,传统的家庭手工纺织业把工业传播到边区农村的每个角落。由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为农村向现代化前进提供了基础和前提。荣维木提出,“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止,但全面抗战的兴起又逐渐地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而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成为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sup>②</sup>无疑,边区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是抗战时期新的现代化因素积累的重要表现。

## Cottage Textile Industry in Jin-Sui Border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Zhang Xiaoling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cottage textile industry in Jin-Sui Border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had opened up a new way to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ntinued the modern cottage industry, which showed the change of economy from the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and was beneficial to Chines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ts development took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rtmentalization, tradition, marke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war. Although traditional factors had been abandoned for some tim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cottage texti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still lied at the foundation of manual textile industry in Jin-Sui Border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A series of institution arrangements of government were key drivers of tradition continuation. History had proven that not only industrialization must keep pace with market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grea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raditional continui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Jin-Sui Border Area; Cottage Textile Industry; 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黄英伟)

<sup>①</sup> 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sup>②</sup> 荣维木:《从抗日战争看中共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近代中国研究网 <http://jds.cass.cn/Item/31450.aspx>,2015年8月25日。